

都市美学与当代文艺、审美难题的求解

何志钧 李志艳

内容提要 当代都市美学范式为当代文艺、审美难题的求解提供了新的视域、思路和切入点。欧洲城市化的进程与现代美学崛起的进程重合在了一起。审美主义与商品化、都市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接受美学的产生有着不容忽视的都市化背景。20世纪中期的都市化进程在多重维度上为接受美学的诞生奠定了前提、基础,接受美学与消费美学息息相通。从后现代大都市的美学旨归入手可以更恰切地理解今日世界文艺、审美的创新时尚,与消费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和欲望的辩证法。

关键词 都市美学 都市化 审美主义 现代性 消费意识形态

古代中国虽然已出现一些大都市,但总体说来,中国传统文化却建基于宗法制社会生活、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和乡村情感体验。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一直较低,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0.6%,远远低于当时世界29%的平均值。因此,以乡村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范式在我国学界可谓根深蒂固,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艺术研究和审美文化研究一直缺少一种自觉、强烈的现代都市意识。今天的中国学人应立足当代都市化语境,自觉高扬都市文化精神,从都市化的高度审视社会百态,思考当代的审美和文艺问题,对当代审美文化建设进行因势利导。

相对于传统的古典美学范式,当代都市美学范式无疑会使我们获得新的眼光、新的高度、现实感和问题意识,为当代文艺、审美难题的求解提供新的视域、思路和切入点。

当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中说“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①时,他实际上强调了现代城市文化、市民文化瞬息万变的动态流变性与传统乡村文化的恒定性、地方性的区别。在当代,灯

火辉煌、五彩斑斓的大都市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中心,大都市的时尚甚至辐射到了最偏僻的乡村,市井的趣味四处弥散。都市文化无处不在,形塑了一个复杂层深的文化场。从都市人生与乡村人生的区别、都市审美体验与农业审美体验的差异入手,我们可以更恰当、更深入地理解和解释许多聚讼纷纭的文化现象、审美问题。

—

虽然古代文明也曾孕育出一些政治中心城市,但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城市化热潮却显然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物。凯尔纳、贝斯特在其《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中曾揭示了现代化、都市化、信息化、消费化的内在关联,他认为现代化标示着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文化分化、商品化、都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的过程,伴随着都市化进程、艺术的散布普及、消费社会产品的日常消费、新型交通与通讯方式的普及,现代性文化全面渗入了日常生活。^②因此,都市化与现代化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长期以来令许多

人备感困惑的美学悖论: 恰恰是在最功利、最务实、最世俗的现代社会中审美主义得以确立, 都市人对利欲的热衷与对审美超越的崇尚竟能并行不悖。欧洲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与现代美学崛起的进程重合在了一起。

自康德以来, 文艺是审美的, 审美是无功利的, 审美经验区别于快感, 有着自身的独特性, 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经验领域的观念又一时间蔚为风行, 深入人心。表面看起来, 现代美学对审美超越、文艺自律的强调与商品化逻辑、消费文化潮流可谓冰火不容, 但实际上二者却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有着内在的关联。^③

没有资本主义的社会大分工和现代性的文化分化, 就不可能产生现代学科的分化, 美学也就不可能脱离伦理学、哲学而独立门户。纵观人类文化史, 独立自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艺术和审美的独特品格, 古代艺术或从属于巫术仪式, 或附庸于宫廷仪式, 或与实用技艺浑然一体, 无法独立自律。艺术自律的思想本身归根结底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产物。正是伴随着现代城市的崛起, 18世纪中期以后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与此基本同时, 现代意义上的文艺概念也脱颖而出。审美、自律文艺与现代分工方式的本质一致性客观上也必然使文艺成为一个独立的分工领域, 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审美、自律在实质上不仅不否定文艺可以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 而且实质上为之提供了观念基础和现实可能性, “艺术的自律同时也是它后来变成他律的前提条件。商品的美学是以自律的艺术为前提条件的”^④。只有当文艺成为一个自律的、独立的领域, 文艺才能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一种与其他商品不同、具有自己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 这恰恰为它成为消费品, 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 转换为交换价值提供了合理性、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由此, 现代美学的兴盛与都市文艺的商品化、消费化并行不悖。足见, 艺术独立、审美、现代性文化、商品化、都市化具有内在的关联。

反宫廷、反教会的现代性文化从一开始就标举世俗化、感性化, 崇奉个性解放, 为享乐主义、物欲横流洞开了大门, 而这与现代美学崇尚的审美

自律、艺术独立却并不矛盾。作为感性学的美学从一开始就强调对立于抽象理性的感性, 对立于彼岸世界的此岸世俗人生, 强调审美、艺术、感性与宗教、理性、道德的张力关系, 文艺与审美从宗教中分离出来, 沉入世俗人生的过程同时也是文艺走向自律, 美学走向独立, 审美主义入主要津的过程。由此, 审美、自律文艺与感性、个体体验和世俗人生欲望获得了内在的一致性。美学成为独立学科, 文艺走向自律也与作为理性自律个体的现代人的产生、个人主义和人本主义的高扬遥相呼应, 感性、特殊、个人与美学、审美主义、自律文艺是一同在现代性文化的胚胎中孕育出来的。审美、自律文艺与世俗生活、此岸世界的内在关联使它只能在世俗生活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基础、生命与活力源泉。如此一来, 它就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义无反顾地走向市场, 走向市井大众, 与金钱、利润、市场经济结伴同行。

审美独立、文艺自律与商品消费、世俗欲望有着同一的一面, 同时也有着对立的一面, 既共生共存, 又剑拔弩张, 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根源于“审美现代性”文化与社会现代性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 “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此以后, 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 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 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⑤如前所述, 这种卡林内斯库所谓的“审美现代性”与“市侩现代性”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它们一同孕育于现代性文化的母胎中, 共同构成了现代性文化的两只轮子。既然理性与感性、天国与世俗、克制与纵欲构成了现代性的两面。那么, 在现代性文化中就既不能离开感性、世俗、欲望, 也不能离开理性、节制、勤勉。这势必导致现代美学的二重性, 使都市化进程中的审美意识同时作为对感性、享乐的支持者和否定者而存在, 它既追随感性又警惕世俗, 既热恋当下又追思永恒。它既是对现代性文化的维护和肯定, 又是对之的否定与超越。这种状况

还与现代都市社会的自我否定冲动和新陈代谢机制有关。都市化进程客观上使现代人的生活瞬息万变,现代都市必须不断否定自我,不断刷新自我,才能永葆活力。由此就不难理解现代都市文艺生活何以既流于情色欲望,又呼唤精神升华。

二

都市化 (Metropolitanization) 堪称是城市化 (Urbanization) 的升级版与当代形态。^⑥ 20 世纪以来浑浩流转的都市化进程在改变社会生活状况的同时也在深层次影响着大众的精神生活方式、审美理想、文艺消费趣尚。当我们把接受美学与欧洲都市化进程联系起来考察时,不难发现现代都市的出现、现代性文化的盛行与读者接受美学的异军突起就有着诸多协同性因素,读者接受美学的产生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都市化背景。读者接受美学发生的时间是 20 世纪中期,恰与欧陆大规模都市化的时间相一致。以尧斯、伊瑟尔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创立了著名的接受美学,都市化不光在事实上成为接受美学的思考对象,也在思维范式、文化理念、美学趣尚上与接受美学不谋而合。

如果说大工业生产时代是一个生产中心的时代,那么,在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的基本问题逐渐转变为潜在的无限生产力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如何有效地刺激需求,拉动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焦点。生产主人公的时代开始让位给消费主人公。都市生活中生产开始退居二线,消费入主要津。与此相应,在文艺生活中,读者也取代作者成为主角。消费的重要性使得受众在整个美学体系中成为主角,接受美学以此为基础获得了广阔的生发空间并凸显出现实理论意义。20 世纪中期的都市化进程在多重维度上为接受美学的诞生奠定了前提、基础:都市是一系列社会变革发生的场域,它作为接受美学产生的文化场域具有语境性作用;都市化进程对社会变革具有相当的敏感性,它所发生的形象变化以及背后的诸多问题成为接受美学的本文基础,它生产了接受美学的思考对象和问题意识;都市化进程是商品形态和生产关系的双向生产,它影响甚至制约着接

受美学的思维模式以及强烈的批判性;20 世纪中期的都市化进程出现了一个历史性转折,生产型都市、现代化都市开始转变为消费型都市、后现代大都市,接受美学同样显示了一种介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之间的过渡性。尧斯恢复了康德主体性观念中互为主体性的积极追求,极大地强调了文学活动的交流性,也突破了现代主义的精神藩篱,隐含着后现代思想的征兆。^⑦

都市化进程与接受美学的受众契合性引发了对读者地位的新认识,而都市化进程不仅彰显出消费中心论,也使得受众地位和反影响作用得到强化和突出。接受反应文论偏重读者阅读对于文学意义的建构和完成,适应了文化工业时代读者市场筹码加重的新趋势。生产和消费本来互为因果、不可分割,但都市化进程的历史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消费中心论则将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制约生产的逻辑程序置换成消费主导生产、生产迎合满足消费的逆反性进程。消费决定生产并不是简单的经济事象,而是一种程序化的逻辑性实现,这体现在:消费首先是一种观念的价值体系,并以相对自由的形式出现,意味着客观存在的和可待发掘的多重市场,在供求关系的源头上控制和引导着生产对象的选择以及数量的确定;消费也是一种社会实践行为,包含着个体性表征与社会影响效果之间冲突与交融的复杂状态,这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应有的实在样态以及可能赋予的文化内涵,如对商品的包装就属于此类;消费的实践性、连锁性决定了消费行为的后延性与时间性,这导致了生产内涵的不断衍生和扩大,商品、场域、时间以及消费欲望都在生产范围之内,确保消费行为的必然性践行成为商品使用价值与附加价值的比重和追加方式的标尺与导向,如餐厅的装潢、良好的音乐氛围、轻松和谐的就餐环境乃至周到的服务等都围绕着就餐这一消费主题展开,体现出消费的多维度性和对生产的控制性;在逻辑理念上,伊瑟尔认为:“文学中的交流是一个处于动态之中并受到调节的过程,启动并调节它的……是一种隐和显、表露与掩盖之间既相互控制又相互扩展的相互作用。”^⑧与接受美学类似,作者努力寻找着理想读者,而生产者则在努力寻找理想

的消费者,并期望把所有的消费者都转变成理想的类型。另一方面,消费者也在寻找着理想而完美的商品及其背后的生产者,二者的相互吻合成为生产理念的核心制导原则。但是消费的前定性、即时变化性、多重选择性以及批判性使得商品的现实达成存在着时间差或者是滞后性,生产控制消费被颠覆,消费逐渐控制了生产周期,深刻影响着经济利益的实现,主导着生产,生产对受众高度重视的必须性与受众主体性表征的交互作用导致了其地位的不断提升。

因此,都市化背景作为接受美学的产生语境为接受美学的批判意识提供了客观性基础,二者在对受众的关注上高度契合,生产—消费(接受)成为二者展开的逻辑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消费通过决定生产来决定都市面貌的既定呈现与发展趋势,也反映了接受美学中读者地位被高扬的合理性和其理论的社会实践性。消费的主导性地位被推崇是消费文化得以肆意的原因所在。从根本上讲,都市是消费社会的滥觞,接受美学与消费美学息息相通。接受美学和消费美学一样处在现代与后现代潮流冲击碰撞的历史性转折点,显示了一种介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之间的过渡性。与消费美学对协商民主、消费者主体间性的推重一致,接受美学也强调读者、文本、作者的交互主体性、动态性、交流性,它内含着一种超越现代性元叙事,疏离工业主义与发展主义,追求人与人、人与外界对话交流、多元共存的后现代倾向。

三

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相一致,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都市化进程出现了新的特点。后现代、全球化的大都市特然卓立于世界。这种超大都市成为功能集成、文化汇融、世界性交往的枢纽,它们往往不仅构成了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的强大堡垒,而且同时也是审美的实体。这类大都市有着很高的文化水准,洋溢着浓郁的审美气息,焕发着永不衰竭的创新活力。而都市的文化化、生活的审美化、经济的美感化、文化的产业化、审美的视觉化感官化、市容的奢华化、肉体的狂欢化莫不在当代都市文学上打下深

刻的烙印。因此,从这种后现代大都市的美学旨归入手可以更恰切地理解今日世界文艺、审美的新变。与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大工业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中心主义不同,后工业化大都市时代盛行的是消费意识形态。在后大都市社会,文艺和审美、娱乐都被纳入了“消费体系”,成为了阿多诺所谓的“文化工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逻辑”被转换成了“资本逻辑”。在极大强化的商品化逻辑的促动下,感官化、欲望化的媚俗艺术蔚为潮流。身体、贫困、异端、颓废、私密情感甚至革命冲动都被转化成了消费意象。表面看来,在后现代都市空间,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触目皆是绿草清流式的美文艺,似乎现代审美主义的唯美情怀依然故我,但实际上这一切不过是体现了后工业大都市时代欲望的辩证法和大都市商业文化的二律背反:欲望的过当势必引起对纵欲的反感和唯美的渴望,暴发户的俗艳趣味在外在和内在的压力与感召下必然催生一种雅化自身的强烈冲动,商业文化有时要以反商业的先锋派面目出现,最现代的享乐有时需要借最古典的感伤来装点和激活。而这恰恰是更好地回归到了消费循环的原点。在这种或平和或激进的商业行为中贯穿的仍无非是消费文化的逻辑,崇奉的仍不过是消费意识形态的旨归。^⑨传奇化地书写日常生活,炮制廉价的快乐人生神话的都市商业文艺之所以蔚为潮流,显然也有其受众基础,它响应和体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美学趣味。正是都市化进程、教育的普及、白领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力军、中产阶层的生活理想占据主导地位最终促成了今日全球范围内都市文化的平面化、小资化。

对审美创新的热衷也同样与此息息相关。在今天,各种文艺创新与商品包装、组合的创新一样日益成为一种时尚,这种创新更多的是一种非原创的要素拼贴重组、形式包装改换、原有产品的翻新,创新的目的是质量提升,而是拉动消费。文艺和审美的创新同样也成为时尚和文化创意,服务于后工业都市以形象战略实现商业利润的运作机制。与传统的乡村社会和工场手工业时代以实物消费为主导不同,后现代大都市盛行的是符号消费、形象消费、品牌消费。确如费瑟斯通所言,

后现代城市以返回文化、风格与装潢打扮为标志,文化的传统意义的情结被消解了(decontextualized),它被模仿、被复制、被不断地翻新并重塑着风格,所以后现代城市更多的是影像的城市。^⑩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在信息化、消费化的后现代大都市语境中,传统的“烟囱工业”日益退居边缘,日益被无烟工业、创意产业取代,文化创意和形象战略日益成为商业利润达成的主导手段,商品形象设计、文化象征意味、品牌附加值成了商品价值的主要支撑。审美、知识、文化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其二,符号、品牌、形象日益成为了今日消费者社会文化地位的区分和编码要素,在都市市民唯恐落后于时尚潮流的身份焦虑中,时尚和创新日益成了市民身份建构、都市经验更新和都市生活修养完善的不二法门,也为都市经济的加速发展输入了生生不息的动力。

后工业化、后现代性文化、都市化进程、信息媒体革命是后现代都市美学赖以存在的事实性基础,它凸显了当代审美文化建设的新特点和新问题。在对待后现代都市文化和审美问题上,我们很容易因其消费化、平面化、拟像化而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实际上,大都市时代也存在毋庸置疑的积极的文化意义,在大都市中,一方面,消费意识形态、商品化逻辑空前膨胀,但另一方面,它也以公民社会、信用经济和市场民主体制、商业文化取代了传统的等级制社会、特权经济和专制文化,这对于社会进步显然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⑪同时,诚如奈斯比特所说:“在农业社会阶段,在时间观念上人们习惯于向过去看,农民根据过去的经验从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工业社会的时间倾向性是注意现在:出货、完工、就事论事、最低限度的目标等等。”“在信息社会里,人们的时

间倾向性是将来。”^⑫都市化、都市精神、都市美学客观上要求人们以前瞻的而非怀旧的,乐观的而非悲观的心态面对瞬息万变的现代都市人生,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从都市文化良性发展的高度积极引导都市文化建设。

①[德]奥苏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3页。

②Steven Best Douglas Kellner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London TheM am illan Press LTD, 1991 pp. 2~3

③参见何志钧《文艺消费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145页。

④[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02页。

⑤[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

⑥刘士林:《都市化进程的世界经验与都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话语》,《中国都市文化研究》2009年第1卷。

⑦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⑧张廷琛:《接受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⑨何志钧:《消费文化·包装·包装逻辑——包装文化的另一面》,《艺术广角》2003年第5期。

⑩[英]麦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⑪何志钧:《消费意识形态与当代文艺消费》,《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6期。

⑫[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梅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作者简介:何志钧,1971年生,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志艳,1979年生,文学博士,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蔚〕

(6) On Formation of Public Policy Conflicts and Construction of Conflict Resolution Mechanism

Qian Zaijian • 94•

The whole process of any public policies from its formulation to implementation is full of policy conflicts. The conflict of public policy reflects the confrontation, competition, controversy, and other tensions between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It also reflects the problems of structure, organization,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so o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Public policy conflicts are not only embodied in the conflict of material interests, but also the value conflict. Public policy conflicts manifested mainly in the conflict of policy objectives, the inter-governmental policy conflicts, the conflicts of policy instruments and the conflicts of the policy benefit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ublic policy conflicts is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including mainly policy value differences, policy sector separation, policy interest gaining, as well as the blocking of policy information, and so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flict resolution mechanisms for public policy conflicts in China today should include the policy value guidance mechanisms, policy consultation mechanism, policy-sector integration mechanisms, the policy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policy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7) Reexamination of Ogawa Sekijirō's Testimony: Examinations on Defendants' Testimonies in Tokyo Trials Regarding Nanjing Atrocities Case Two

Cheng Zhaoqi • 143•

Due to the limits of evidence, the Far Eastern Allied Tribunal (Tokyo Tribunal), in its hearing of the case of the Nanjing Atrocities, failed to adequately inquire into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the defendants. This fact in turn had an impact on the tribunal's verdict and the Japa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Tokyo Trials as well. Ogawa Sekijirō, who was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in charge of crime punishment, did not totally deny in the tribunal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Japanese troops, hence his testimony seems to be somewhat impartial, and therefore neither the prosecutors nor the jury further questioned him. However, through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records made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that is, those made by the Department of Law Enforcement of the Tenth Army and in the Military Law Meetings of the Central China Front Army—and those kept by Ogawa himself—that is, his diary—all of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the first time records, this paper finds that what Ogawa provided was false testimony.

(8) Jiangnan Scholars' Idea of Livi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Its "Aberrant" Phenomenon

Xu Yongbin • 164•

The phenomenon of scholars' idea of living in Jiangnan (south of Changjia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more pervasive than before, although the actions of the scholars' living had occurred before. The developed economy and culture provided the fertile land for scholars to make living in Jiangnan area. There were lots of channels for the scholars' making living which were involved in more extensive and embedded fields than before, such as throwing themselves into educational market and artistic market, setting foot in publishing field, getting remuneration through writing compositions for others, lousing around all corners of the country for eating or earning, doctoring, fortune telling, farming or even some humble vocations in traditional society. Scholars' living was no more in a disguised manner as before, but open to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morals for living, even by unfair or shameful means.

(9) Issue of Culture Production under Market Economy: In Critic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Spirit Production

Chen Qijia • 195•

Marx was among the earliest to notice the influences of market condition on social spirit and culture production in the system of capitalism. H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existed a trend of spirit production in market system: the value of market system had actually been the leading and determining indicator of human beings' spiritual activities. After Marx, to come up with the newly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he western Marxist including Lukacs, Benjamin, Guy Debord and so on, launched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studies on the control of market system over social spiritual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on the resulting deepening of human alienation. Such research instructively and warningly assists us to take a better view of the issue of culture production under market economic environment.

(10) Metropolitan Aesthetics and Exploration of Literature Art and Aesthetic Problems

He Zhijun Li Zhiyan • 209•

Contemporary metropolitan aesthetic paradigm provides us with new sight point and line of thought for the solu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aesthetic problems.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urbanization coincided with the birth of modern aesthetics. Aestheticism is deeply inner related to commodity and metropolis. The birth of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is rooted on the metropolitan background. The metropolitan process in the mid of the 20th century provided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with prerequisite and base of its birth in multi-dimensions, and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aesthetics of consumption. From the goal of aesthetics of post-modern metropolis,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ner relation and desire dialectics among today's world art, the fashion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 innovation, and the ideology of consumption.